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二辑）

Social Change

社会变迁

〔美〕乌格朋 (W.F.Ogburn) 著 费孝通 王同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历史学 (第一辑)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美] 乌格朋 (W.F.Ogburn) 著 费孝通 王同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美) 乌格朋 (Ogburn, W.F.) 著; 费孝通, 王同惠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76-7

I . ①社… II . ①乌… ②费… ③王… III . ①社会变迁－研究 IV .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01号

社会变迁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76-7/K.324

定 价: 92.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人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序 言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院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著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烏格朋 (W.F.Ogburn) 著 費孝通 王同惠 譯

社 會 變 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原序

我們這一代特有的大量的社會變遷引起了許多重要的社會進化及實際改造計劃的社會學理論。我們下面所要講的並不特別注意於實際計劃的討論。而是偏重比較普遍或比較基本方面的社會變遷，這些自然並不是對於某項特殊的問題而發的，我們所要討論的是關於變遷的性質，為什麼社會要發生變遷，為什麼有些狀況會阻礙變遷，文化是怎樣生長的，文明怎樣會發達到現在的地方。討論這些問題時，就得牽涉到發明的性質及其數量，以及人的意志及其本性與發明的關係。這些變遷是由於人類的社會遺產所引起的呢，還是由於生物的人性所引成的？如果人性及智能都不變，那麼由末次冰期以來的巨大進步有產生的可能麼？我們更願討論在這許多變遷裏，人性的適應是否圓滿，人性對新狀況的適應是否較舊的更善，以及社會失調的數次及程度如何。要討論這些問題，我們除引用社會學的研究外，猶須採取其他科學如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經

濟學等的材料。

讀者自願知道對於此類廣闊的問題如何可用科學的探討。普通俱認為科學方法着重事料的證實。事料搜集的極為重要。自難否認，但是所搜集之事料務須與題材有關，必有所欲證實的問題。所以構造假設實須和搜集事料同時並舉。事料之隨意搜集和研究每於學理之推求無所助益。人類時常有想知道的事，知識的要求有如經濟的要求。尤其在科學始昌的時候，所要求的常過於所可供給的；而且所要求的又常不屬於專門及單純者。因之所需研究的亦時常很廣闊，須到後來纔漸漸分為一串特殊的問題。所以在任何科學的早期，都有一需加研究的廣闊的園地，以作初步工作，然後引入特殊假設之證實工作。

關於特殊問題的分析是要看事實怎樣了。搜集的材料越完備，則分析亦越正確。材料若不完備，而欲得正確之分析，則須將假設立於後來可以證實或推翻的地位，而且貴在能洞澈科學之趨勢及迎合一般的需要。偏見及感情用事都是使人發生錯誤的估價及結論的陷阱。在事料搜集未完備時，自防發生錯誤的方法，即在檢察自己偏見的來源。

讀者或將不滿本書的結論，因爲它並沒有像普通所見者的有力，並且包含許多猶豫兩可的說法。作者固覺此種不決之詞爲其遺憾，但題材太廣，事料太缺，實逼出之。本書縱然缺點很多，但對於各種學說之加以批評考量，於讀者亦不無可助之處。至於猶豫兩可之決斷，在科學知識發達過程中，實與敢膽之學說有同樣之需要。

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想來編置社會學中各問題，使它們各得其所以成一普遍性質之社會學原理。所以本書的編置好像是不很勻稱的。所偏重之處，在相當程度之下固然是因其重要，但亦常因其尙屬新見，或至少讀者不常注意之故。

本書中未能將取材的出處一一指出，固屬遺憾，但是其實亦無人能一一自知其觀念的來源的。所述者多係多年閱讀之結果。說雖如是，但熟習普通社會學知識的讀者定不難代指本書所引用之出處的。

目次

第一編 社會遺產及人類的先天本質	一
第一章 社會遺產.....	一
第二章 人的先天本質.....	五
第三章 人的文化及心理本質的混淆.....	九
第四章 文化因子及心理因子的區別.....	一三
第五章 生物因子的過於重視.....	二二
第六章 幾個社會學概念的重行考究.....	三〇
第二編 社會進化.....	三九

第一章	社會進化的概念	四〇
第二章	社會變遷中的生物因子及文化因子	四四
第三章	初期文化發展的記載	四八
第四章	物質文化的累積及分異	五三
第五章	發明天才及文化	五八
第六章	二人以上獨立創造的發明和發現表	六四
第七章	人類的生物變遷	八六
第八章	文化變遷及生物變遷的相互關係	一〇七
第三編	文化惰性及保守性	一一五
第一章	文化滯留的種種觀念	一一六
第二章	遺俗	一一九

第三章	文化的效用	一一一
第四章	發明及傳播的困難	一二六
第五章	特殊利益	一三一
第六章	傳統的力量	一三四
第七章	習慣	一三七
第八章	社會壓力	一四二
第九章	不快的遺忘	一四七
第十章	心理特質的保守性	一五〇
第四編	社會失調	
第一章	文化落後的假設	一五六
第二章	工人意外災傷的撫卹	一六五
第三章	以賦稅家庭國際關係商會代議制政府及阿利重納印第安居民爲	

例	一八四
第四章 發生文化落後的原因	一九八
第五章 文化各部的關係	二〇五
第六章 物質文化是現代社會變遷的根源	二〇八
第五編 文化及人性間的調適	二一九
第一章 穴居人在現代城市中的學說	二二〇
第二章 缺乏調適的證據：神經病和瘋癲	二四〇
第三章 缺乏調適的證據：社會問題	一五五
第四章 改變人性對控制社會進化	一五九
第五章 如何能得較好的調適	一六七